

论阿 Q 的精神反思意义

张梦阳

内容提要 《阿 Q 正传》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发表至今已有一百年了。阿 Q 早为人们所熟悉，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罕有的进入世界文学典型画廊的人物形象。百年来关于阿 Q 一直存在着学术争议。本文认为阿 Q 是与世界文学中的堂·吉珂德、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等人物相通的偏重反映人类精神弱点的艺术典型，达到了深刻的哲学境界，具有巨大的精神反思意义。人们以这些典型为“镜像”看见自己，开出反省的道路，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促使自己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

关键词 鲁迅；阿 Q；精神反思；认识自己

一

今年是鲁迅诞辰 140 周年，他的代表作《阿 Q 正传》也已经发表 100 年了。

1921 年鲁迅四十岁时，从 12 月 4 日起，至 1922 年 2 月 12 日止，《阿 Q 正传》在北京《晨报附刊》分章连载，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署名巴人。

1922 年 1 月 2 日，一位名叫谭国棠的读者，给《小说月报》编者写信说：“《晨报》上连登了四期的《阿 Q 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 Q 正传》也算不得完善了。”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却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 Q 正传》的伟大价值，明确指出：“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 Q 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 Q 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 Oblomov 了！”^[1]

人们对事物的最初直感，往往比以后由于种种干预而被扭曲的认识包含更多的真实成分，何况是沈雁冰这样的文学天才。他这段对《阿 Q 正传》

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百年间《阿 Q 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 Q 正传》的真义。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联想，则启悟研究者发现阿 Q 作为世界文学中的艺术典型的价值。“总觉得阿 Q 这人很是面熟”一语，道出了这类艺术典型令人产生精神反思的深刻意义。

连载过程中，不仅大评论家沈雁冰“总觉得阿 Q 这人很是面熟”，有的读者也疑心是与自己相关的作者在骂自己。涵庐，即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 4 卷第 89 期上发表的《闲话》讲过这样的情形：“我记得《阿 Q 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看来阿 Q 一诞生，就引起人们的自我联想。

《阿 Q 正传》在《晨报附刊》连载完毕一个多月之后，直接了解鲁迅创作意图的周作人，以仲密的名义在《晨报附刊》的《自己的园地》专栏发表了《〈阿 Q 正传〉》一文，着重透露了《阿 Q 正传》的主旨：

阿 Q 这人是 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万国的类型”，阿 Q 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噩梦似的四千年来的

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世界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眼见到这一类角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2]

周作人的以上说法，的确非常符合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

1925年5月，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道：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3]

毫无疑问，“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使读者从作者“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中，感到“我们的传统思想”给国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由此“自己觉醒”——这正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

那么，这一主旨是通过怎样的人物加以表现的呢？是通过“提炼精粹，凝为个体”而成的活生生的阿Q。鲁迅1934年11月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描摹过阿Q在自己心目中多年的影像：

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4]

这个影像，与周作人所披露的阿Q的生活原型——“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是相似的。由此可见，鲁迅关于《阿Q正传》创作主旨的自述，与

周作人、沈雁冰等人的评说基本一致。

阿Q后来的命运，确如沈雁冰1923年的《读〈呐喊〉》一文所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普遍的弱点来了。”^[5]

1927年11月10日，沈雁冰以方璧的名义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鲁迅论》。这篇论文是20年代鲁迅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文中对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作了进一步升华：“《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如果你“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Q正传》”；“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6]。

实际上也是如此，阿Q诞生这100年来，受到罗曼·罗兰等世界大文学家的赞扬，说“阿Q的苦脸永远的留在记忆中”^[7]。很多评论家认为“阿Q相”反映了“人性的普遍的弱点”。阿Q已经成为精神胜利法的代称，进入世界文学典型的画廊，引发中国人和外国人多方面的精神反思。

二

但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阿Q研究又出现了曲折和争论。

1951年11月1日，《人民文学》第4卷第6期上，冯雪峰发表了一篇引起长期争议的论文：《论〈阿Q正传〉》。在这篇论文中，冯雪峰首先对鲁迅

的历史身份与独特价值作了这样的认定：“鲁迅由于他自己所选定的历史岗位，是政论家，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所以他越是像他对付杂文一样，以一个政论家的态度，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态度，去对付他的小说，则他的小说也就越杰出，越辉煌。否则，就要因为不能高度地显出鲁迅自己的这种特色，而那作品在鲁迅自己的作品里面也就要显得比较地逊色了。这是只要拿他的《呐喊》中的主要的作品和他的《彷徨》中的作品，加以比较，就能够显然判明的。”从这样的认定出发，冯雪峰对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阿Q从一方面说，与其说是一个人物的典型化，那就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二、阿Q“作为一个流浪的雇农来看，固然也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然而阿Q并不完全是中国雇农的典型或流浪的雇农的典型。一个简单的证明就是阿Q这形象的主要的特征，对于一切的阿Q主义者，一切‘精神胜利法’者，一切自欺欺人者，都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三、“阿Q，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式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8]。

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观点一提出，立即遭到驳难，冯雪峰本人也感到这篇文章“论得太空泛，并且有的在解释上是错误的，所以在《论文集》再版时就抽掉了”^[9]。

随着冯雪峰收回观点并受到无情批判，另一种庸俗的阶级论观点泛滥了。《用土改医治阿Q》《结束了阿Q的时代》《武训与阿Q》之类的文章反复出现在报刊上，牵强附会地把阿Q与现实挂起钩来，纷纷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有的定为“二流子的典型”，有的定为“农民的典型”，有的认为是“没落人物”的典型，主要根据是阿Q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把阶级论绝对化、庸俗化，不仅导致阿Q典型研究误入歧途，而且在整个文学理论领域造成了混乱。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何其芳在1956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论阿

Q》。该文主要观点是：阿Q性格上最突出的特点精神胜利法不只是存在于当时的落后农民身上，而是在当时许多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见到。文章以文学名著中的诸葛亮、堂·吉珂德等不朽典型为例证，说明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是在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就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共名”，堂·吉珂德成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的“共名”，阿Q则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共名”。文章批评文学研究中把阶级和阶级性的概念机械地简单应用的现象。这就是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共名说”。

在学界把阶级论推向绝对化、庸俗化的左倾氛围中，何其芳敢于对文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典型性等于阶级性的观点提出反驳，对阿Q典型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疑难提出独立的解释，表现了难得的理论勇气和独立思考精神。

何其芳的《论阿Q》问世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1956年12月15日，李希凡在《新港》第12期发表了《典型新论质疑——关于阿Q典型问题的商榷》，认为何文有把问题引向另外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把阿Q典型性格“最突出的特点”——精神胜利法当作某些人类普遍的弱点，而不是特定的时代、社会、民族和阶级的产物，忽视了产生阿Q主义的物质基础，忽略了“特有的时代背景”，抽去了活生生的性格具体的精神状态，使它们成为“阿Q精神”的概念，“只是语义上的代替”，“把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导向抽象的人性论的陷阱”。后来李又在《〈阿Q正传〉简论》一文中，强调阿Q是一个真实的时代的社会的典型，精神胜利法并不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10]。

何其芳不同意李希凡的驳难，1964年1月25日，在《收获》第1期发表了《关于〈论阿Q〉——〈文学艺术的春天〉序文的一部分》，对李希凡的文章作了答辩。该文首先分析了“典型的共性就是阶级性，典型的个性就是阶级性的具体表现”这个公式的悖谬，指出认为“典型性就完全等于阶级性，或者认为一切典型人物的一切共性的概括性都只能限于一个时代，等等，那倒真是有些‘现实和概念被倒置起来’了”。何其芳的《关于

《论阿 Q》，在理论上比《论阿 Q》更为严密，也更勇于面对事实，不再采取迂回的方式，而是直接承认“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都可以有阿 Q 精神”这一事实，启示后来的研究者们将视野拓展到世界文学的广阔范畴内，对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的差异和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发现阿 Q 与堂·吉珂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具有共同的特点与规律，发现他们对人类各个方面的精神启悟意义。

承认精神胜利法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是否就等于否定阶级论呢？不是。实际上鲁迅创作《阿 Q 正传》时，是运用了阶级论的。不仅阿 Q 身上存在精神胜利法的弱点，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统治阶级人物表现得更为丑恶。赵太爷不许阿 Q 姓赵，把受压迫者的姓氏权都剥夺了，“革命”后又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 Q”；“假洋鬼子”从城里回来，没捞到一官半职，就在人前一边谎称黎元洪再三再四请他上湖北，他还没有肯，一边扬起着丧棒不准阿 Q “革命”，这不是无耻透顶的精神胜利法，又是什么？鲁迅真不愧为文学大师，两三笔随意一点，人物就神形毕现，跃然纸上。那么，鲁迅为什么不以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为主要人物，而专以阿 Q 为中心呢？因为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是受压迫、被侮辱者的自我的消极抵御，可怜、可悲，令人同情，鲁迅对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的精神胜利法是压迫者、辱人者的逞凶与显摆，可憎、可恨，让人愤怒，鲁迅对他们是要痛打的。纵然各阶级都可能精神胜利法的表现，但内容和性质是不同的，鲁迅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1926年5、6月，敬隐渔首次把《阿 Q 正传》翻译成法文，发表在《欧罗巴》杂志上。《阿 Q 正传》一共九章，敬隐渔的译文却变成了八章，把第一章“序”整个删掉了。据说鲁迅一方面对罗曼·罗兰的称誉感到荣幸，另一方面对译者删去“序”很不高兴，因为“序”精辟地勾画出了旧中国的缩影——未庄的阶级对立状况，精炼地反映了未庄各阶级人物的不同地位和心态，如果删去，就难以看到中国社会的阶级情状和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胜利法。这充分说明，承认精神胜利法是“人性的普遍的弱点”，并不意味着否

定阶级论。研究典型人物应该从人类性、民族性、阶级性、乡土性、个体性这五个层面着眼，忽视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

关于阿 Q 典型性的何、李之争，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持续了将近十年。阿 Q 典型研究中的困难和矛盾，始终困扰着何其芳这位勇于独立思考的文学理论家，即便在患难中他仍然明确坚持自己的观点，孜孜不倦地指导青年求教者继续研究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并一再表示待以后有了话语权还要写文章再论阿 Q^[11]。何、李之争，虽然双方都有意气用事之处，但从总体上说是一场严肃、深入的学术理论论争，双方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谈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综合双方所谈的真理部分，继续向前进行思索，无疑会有助于阿 Q 典型研究的进展。

当然，双方所占的真理部分并非半斤八两，完全均等。从文艺思潮以至整个社会政治思潮的宏观流向来看，何其芳所占的真理是主导的。因为他批评把阶级论推向绝对化、庸俗化的左倾思潮，反对阿 Q 典型研究以及整个理论领域里的简单化倾向，坚持科学的研究态度，虽然理论上有不完善之处，却是符合阿 Q 典型研究史上的学术主流，符合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宗旨和本意的。这对于扭转已经把阿 Q 典型研究引入死胡同的绝对化阶级论倾向，回到鲁迅创作本意上来，继续进行健康、正常、深入的研究，揭示阿 Q 作为不朽艺术典型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三

何、李之争的一个历史作用，是使阿 Q 典型研究不再停留在给阿 Q 划定阶级成分这种幼稚行为上，而正如上世纪 80 年代重新出山后立即投入阿 Q 典型研究的著名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陈涌同志所说：阿 Q 研究已上升为鲁迅研究的理论核心，牵涉到“文学以至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12]。

冯友兰先生用生命最后十年的心血凝聚而成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汇聚了他毕生的思想结晶。在该书第一卷的全书绪论中，有这样一段发

人深省的话：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13]

究其根本，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追问和反思。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14]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一部名著的题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力求认识自己，认识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其实是整个人类的科学探求始终不变的终极目标，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直到爱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学家的现代宇宙观，实质上都是在探索着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关系到许多根本性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鲁迅也思考过宇宙的问题，在1935年6月29日致唐英伟的信中说过：“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15]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从浩茫的宇宙降落到现实的硬地上，致力于对中国人的精神的反思。早在1908年留学日本期间他就在《摩罗诗力说》中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呐喊·自序》中总结道：他弃医从文的原因是“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6]。之后，鲁迅这位“精神界之战士”，就一直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着深层

的反思。经过十年的思索，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狂人日记》，就是一篇对中国历史进行精神反思的宣言。宣言中所说的“吃人”，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精神的相噬。如果简单理解成肉体的相噬，就是一种偏颇，偏离了鲁迅的本意。1921年12月开始连载的《阿Q正传》，是鲁迅精神反思的全面结晶。鲁迅不仅反思自己，而且希望通过阿Q这个艺术典型唤起中国人的精神反思。这种反思，不仅对于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对于整个人类，也是最为重要、带有根本性的。

塞万提斯在《堂·吉珂德》里借主人公的口说：“喜剧依照西塞罗的意见应该是人生的一面镜子，世态的一幅模样，真理的一种表现。”莎士比亚同样借哈姆雷特的口说：演戏的目的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阿Q、堂·吉珂德、哈姆雷特等偏重反映人类精神状况的艺术典型各自都是一种讽世的镜子，人们可以从中照出自己的精神面貌。它们最重要的哲学启悟意义就是：对人们的认识逻辑、方法进行反思，启示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高尔基称赞契诃夫的作品“能够使人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哲学境界是文学作品最难达到的峰巅。鲁迅写《阿Q正传》也正是“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

几千年来，精神胜利法这种精神现象在中国是很突出的。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等传教士携“西学”来华，中国知识分子便喜欢以一种“老子化胡”式的想象来理解“西学”，以保持对“中学”的自信。甚至一些学者中的佼佼者也这样认为，譬如黄宗羲曾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王夫之在谈论西洋历法时，也说“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可守也”；方以智说，西方历法虽然精准，但其实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其皆圣人之所以已言也”，只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被西方人捡了去发扬光大。真正让举国知识分子对“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信以为真的是康熙皇帝。他自传教士处学了如

何以数学方法计算河水流量的知识，又转头召集群臣当场示范，使群臣们“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而达到折服汉人知识分子的目的^[17]。他曾写过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宣称西方历法起源于中国。上有康熙负责给出“正确结论”，下有御用学者负责“论证”，“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遂成为康熙时代不容挑战的“文化常识”。

1879年，王之春编成《国朝柔远记》，全书共十九卷，跨度二百三十年，但重点放在从道光十九年（1839）至同治十三年（1874）的三十五年，这后三十五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意在说明鸦片战争后这三十五年间的“柔远”远胜于此前的一百九十五年。事实上，19世纪中后期的三十余年，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些如何能说是“天朝”的“柔远”呢？

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种精神现象呢？鲁迅在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中道出了原因：“屹然出中央而无校讎，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四外国家“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这种唯我独尊、鄙夷四方的观念在中国人头脑中充斥了几千年，降至近代，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然而在致命的打击面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却拒绝正视现实，承认失败，以总结教训，重振国风，反而文过饰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靠虚假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和国民的灵魂。于是，精神胜利法就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正如何其芳等许多研究者都引证过的那样，近代中国充满精神胜利法的实例：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将军奕山向英军求降，对朝廷却诬报打了胜仗，说“焚击痛剿，大挫其锋”，英人“穷蹙乞抚”。道光皇帝居然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经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又据奏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命通商。”^[18]像这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比起阿Q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辛亥革命之后，精神胜利法依然盛行。《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发表过林损的一首诗，开头两行是：“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已经陷于闭着眼睛求圆满的“瞒和骗”的大泽中不可自拔，精神愈益沦落了。因此，这一时期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佛教所主张的来个“狮子吼”，大喝一声，使之猛醒，实现精神的自觉。

鲁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是这一重任的承担者。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并提出这样一段名言：“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其意是：首先要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解释，则是：认识自己，又认识世界，在周严的比较中达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然后才能升华到自觉的境界。这一点，实质上是人们学习哲学、增加智慧的要旨所在。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教授就认为哲学作为智慧的核心问题是，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认识自己，并在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转识成智”和培养自由人格。这些观点，在他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书中得以充分展开。

一个人需要通过精神反思认识自我和世界，一个国家、民族也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家，不断进行精神反思，使自己的祖国保持正确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清醒理智。深通中国历史的鲁迅，在对中外历史的比较以及对清末现实的深刻研究中，概括出了“精神上的胜利法”这一命名。精神胜利法正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阻隔，使人们在物质世界失败后，退到精神世界寻求虚假胜利的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奴隶性的哲学。

鲁迅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以文学为武器启悟“偏不肯研究自己”^[19]的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在正确的认识中由“本能的人”“蒙昧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智慧的人”，实现从青年时代就树立起的“立人”理想。《阿Q正

传》最为集中、最为充分、最为艺术地体现了这一用意。

为什么鲁迅在《阿Q正传》中以阿Q为主角呢？除了前文说过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阶级立场之外，从艺术手法上讲，还在于阿Q是一个本能的蒙昧的人，他的“行状”看似鄙俗，却很能简明地反映精神胜利法这种哲学。例如“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后，“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又如人们嘲笑他的癞头疮，几番反抗无效后，阿Q“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这些叙述简单明了地阐发了精神胜利法的弱点，在幽默风趣的讲述中化深奥为易解，又使读者感到可笑而可怜。倘若以赵太爷、假洋鬼子一类人物为主人公，不仅会引起读者的厌恶，而且由于这种人比阿Q复杂得多，言语也虚假绕弯得多，很难简明地表达哲学道理。

阿Q缺乏认知能力，始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以自我为中心，瞧不起城里人，也看不起未庄人。得意时趾高气扬，欺侮弱者；失败时又靠精神胜利法，化失败为胜利，在“瞒和骗”中寻求圆满。阿Q的这种性格是世界非文明时代人类荒谬性的象征，阿Q式的“革命”——身体造反、感官享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喜欢谁就是谁——只是动物性的奴隶性造反，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支克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总结历史教训时提出了警告：“不能做阿Q式的革命家”^[20]！

塞万提斯通过堂·吉珂德这一不朽形象表现了人类容易脱离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陷入主观主义误区的普遍弱点。鲁迅则通过阿Q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当时中国的一种昏聩颓废、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阿Q正传》可以说是鲁迅这位思想家型的文学家创作的哲学小说。阿Q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堂·吉珂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重表现人类精神机制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

为“精神典型”。以这些典型人物为镜子，人们可以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阿Q正传》是鲁迅作品中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正如陈涌所说：“鲁迅即使没有其他著作，只要有一部薄薄的《阿Q正传》，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人可比的最伟大、最深刻的作家。”^[21]鲁迅《阿Q正传》的发表，标志着这位“精神界之战士”担负起改变中国人精神的“立人”重任，成为不朽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后来他继续沿着这条道路深化下去，晚年通过《清代文字狱档》和明代野史的阅读，在《隔膜》《买〈小学大全〉记》中，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不悟自己之为奴”^[22]、与统治者之间存在“隔膜”的政治幼稚病；在《病后杂谈》及《病后杂谈之余》中，又从“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的历史现象入手，开始思考怎样结束改朝换代的历史恶性循环问题，可惜还未深入就去世了。鲁迅为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文明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阿Q正传》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阿Q和他的精神胜利法在中国还很普遍，确实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

堂·吉珂德到临死时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骑士；阿Q则是直到被押往法场时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两个艺术形象都是绝妙的“镜子”，启悟人们认识自己，实现精神的自觉。而阿Q又是中国化的，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启悟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这样评价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全世界没有比这更深刻、更有力的作品了。这是目前人类思想产生的最新最伟大的文字，这是人所能表现出的最悲苦的讥讽。到了地球的尽头，人们会被这样询问：‘你们可明白了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吗？你们怎样总结这一生活呢？’那时人们便可以默默地递过《堂·吉珂德》去，说‘这就是我给生活作的总结，你难道能因为这个责备我吗？’”^[23]惺惺惜惺惺，创造精神典型的大作家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们正是从“到了地球的尽头”的整个人类的终极意义上，从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幻想与现实这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出发，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作了根

本性的总结，对人们进行根本的精神启蒙。这正是哈姆雷特、堂·吉珂德、奥勃洛摩夫、高略德金、伊凡·卡拉马佐夫和阿 Q 等精神典型根本的相通点。从阿 Q 这个精神典型的创造，到后期的阿金这一形象的塑造，鲁迅都是从根本上总结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启悟他所挚爱的中华民族从精神幻觉的迷梦中觉醒，挣脱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正视人生，直面艰难的物质实境，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这才是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启蒙。如果阿 Q 诞生百年后的今天，有人问我们：“你们可明白你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吗？”我们便可以默默地递过《阿 Q 正传》去，说“这就是我们觉醒的总结，我们还会以此为‘镜像’继续提高我们觉醒的境界”。

人类心灵中存在的一些东西，人们往往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在有人指出，逐渐从理性上悟出后，才清晰地发现它。杜勃罗留波夫评论莎士比亚时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剧本中有许多东西，可以叫作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他的文学活动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而且只有几个哲学家能够从老远地方把它指出来。”^[24]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过类似的话：“莎士比亚——这是先知，由上帝派来向我们宣布人和人的心灵的秘密。”^[25]阿 Q 与世界文学中堂·吉珂德等屈指可数的反映人类精神机制的精神典型，确实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包含着“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创造这些精神典型的大作家们，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先知”。这正是他们拥有世界性意义的原因。阿 Q 精神胜利法这样的弱点，几乎人人心中多少有一些，但不自觉，深读了《阿 Q 正传》，受到阿 Q 的“行状”的启悟之后，人们反思自己，就会明显地感觉出来，开出反省、改正的道路。阿 Q 等精神典型就是这样发现和透露“人和人的心灵的秘密”，从而拥有全世界全人类的深刻意义。但这也必须有几个哲学家和潜心求道的研究家“从老远地方把它指出来”，光靠自读是不行的。

为什么鲁迅当年担心《阿 Q 正传》“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因为他留心几种评论，觉得“《阿 Q 正传》的本意”“能了解者不多”^[26]。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曾有一部笑剧《王先生的秘密》轰动一时，有人称王先生为都市的阿 Q。当时就有人撰文尖锐指出：王先生只是“一个小丑，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社会的典型。《王先生的秘密》只有趣味性，没有阿 Q 精神，当然王先生不是阿 Q”^[27]。《阿 Q 正传》绝不是表面化地描写阿 Q 的可笑言行，而是穷根究底地找出这种可笑言行的精神根源，明确概括为“精神上的胜利法”，详细而清晰地传达和描写出来，使之升华到精神典型的境界。鲁迅创造精神典型的意识的确较之前人更为自觉、明朗。但其中的哲学本意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所以“能了解者不多”。

也有人通过艰苦努力了解了鲁迅的本意。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王冶秋就在《〈阿 Q 正传〉读书随笔》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人们阅读《阿 Q 正传》时的接受过程：“这篇民族的杰作，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呕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视阿 Q 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 Q 还是阿 Q；第七遍：阿 Q 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四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28]

当代作家也有这样的反馈。作家林希说：“每次读《阿 Q 正传》，都承受一次被鞭笞的疼痛，疼痛到渗出心上的血。但愿我不是那个唱着‘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未庄好汉，挨王胡打，在小 D 面前逞英豪……也许我不是，但我的先人是，我未来的子孙也可能还是。”^[29]林希说出了读懂《阿 Q 正传》的人们的共同感受。

这正符合鲁迅的本意和初衷，鲁迅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过：“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30]所谓“开出反省的道路”，实质上就是作家设法把自己的精神意向传达给读者、又设法使读者逐渐接受、进行反思的道路，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其中包含着接受美学。鲁

迅虽然没有运用这种术语，但是对接受美学的基本原理却早就谙熟并有详尽的阐发，早期在《摩罗诗力说》中就阐述过这样的原理：人人心中“有诗”，但是大多数人“未能言”，要靠“诗人为之语”，为之“握拨一弹”，读者则“心弦立应”，而且“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产生积极的反响。

这一百年来，《阿Q正传》几乎成为考验一个人阅读力、领悟力和思想水平的试金石，启发人们精神反思的警示器。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地外文明的探索，日益不可遏制。这种探索，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认识领域，更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使人类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的深刻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人们开始认识到“思维着的精神”极可能并不是只有地球上才存在的“最美的花朵”，也许在无限宇宙的某一个星球上，有比人类发达得多的智慧生物，与他们相比，我们人类只是宇宙中的儿童。阿Q精神，正反映了处于儿童期的人类在精神上的荒谬性。如果不克服这种荒谬性，人类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从这一点展开思路，就会更加迫切地感到探究阿Q等精神典型的精神反思意义的必要性。只要是智慧生物，具有“思维着的精神”，都永远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精神反思问题，都要正确处理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幻想与现实这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都要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因此，阐发智慧生物精神发展的深层共性，也许会是未来精神科学研究的前沿性课题。纵使到了遥远的未来，阿Q、堂·吉珂德、哈姆雷特等促发人们精神反思的精神典型，也将保持他们底蕴无穷的哲学启悟意义。

四

上世纪80年代出现过研究阿Q的热潮，有文章论述阿Q的性格系统，确实令人开拓视野，耳目一新。但是，鲁迅研究的前辈权威学者唐弢先生当时就尖锐指出：大谈特谈阿Q的性格系统，却忽略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31]。而今回头反想，从心底敬佩唐先生的眼光。最近，当代作家毕飞宇解读《阿Q正传》的文章，

对精神胜利法在阿Q性格系统中的本质意义提出了独到的阐释。毕飞宇这样说：“从逻辑上说，胜利属于判断，是判断就涉及依据，它是实证的结果。阿Q则不需要那些。他的胜利只不过是他的‘意愿’，他自己‘宣布’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精神胜利法’。我要说，封闭系统的确立，表示着‘精神胜利法’的最终完成，表示着阿Q这一性格特征的确立。阿Q的一切‘行状’，就是沿着封闭系统的内侧，注意，是内侧，是黑咕隆咚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32]具有灵气和创作实践经验的作家的判断，往往比书斋里的学者更为灵敏准确。

“认识你自己”是先祖的提醒和哲学的最高目标，绝非易事。英国诗人彭斯这样写道：“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赐我们一种才能，可使我们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是神明才能赐予的才能，可见其难了。其实，神明是企盼不来的，人间存在的有助于启悟人们认识自我的力量，来自读书、思考和自省。《阿Q正传》《堂·吉珂德》等经典著作正是我们了解自己的最好“镜像”。

就《阿Q正传》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镜像”的焦点，引发我们的精神反思。如果忽视了精神胜利法，别的性格讲得再“系统”，阿Q也会失去意义。鲁迅对精神胜利法的命名和形象的表现，不仅是对中国的贡献，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鲁迅是位擅长逆向思维的伟大思想家。他往往是以反树正。他在27岁的青年时代提出“立人”思想，37岁时以“狂人”周围的人反衬“真的人”，40岁时又以阿Q为反面典型启悟自己的同胞应该怎样“立人”，做怎样的人。百年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始终发挥着“镜像”作用。人们以阿Q为镜照见了自己，促进了精神反思，逐步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促使自己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

[1]《通讯》，《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转引自《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第2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 [2] 仲密:《〈阿 Q 正传〉》,《晨报附刊》1922 年 3 月 19 日。
- [3] 鲁迅:《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8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4] 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中华日报》副刊《戏》第 15 期,1934 年 11 月。
- [5] 雁冰:《读〈呐喊〉》,《时事新报》副刊《文学》1923 年 10 月 8 日。
- [6] 方璧:《鲁迅论》,《小说月报》第 18 卷第 11 期,1927 年 11 月。
- [7] 柏生:《罗曼·罗兰评鲁迅》,原载 1926 年 3 月 2 日《京报副刊》,见《汇编》第 1 卷,第 155 页。
- [8] 冯雪峰:《论〈阿 Q 正传〉》,《人民文学》第 4 卷第 6 期,1951 年 11 月。
- [9] 参见《冯雪峰论文集》下卷,第 30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 [10] 参见李希凡《〈阿 Q 正传〉简论》,《弦外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7 年版。
- [11] 详见拙文《一个青年求教者的回忆——追忆敬爱的老师何其芳同志》,《北京文艺》1979 年第 8 期。
- [12] 陈涌:《〈阿 Q 正传〉引起的争论》,原为 1981 年 9 月在巴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报告会上宣读的论文,后收入《鲁迅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1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 1 册,第 9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14]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第 3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 [15] 鲁迅:《350629 致唐英伟》,《鲁迅全集》第 13 卷,第 493 页。
- [16]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39 页。
- [17]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 154,第 698—699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18] 转引自何其芳《论阿 Q》,《人民日报》1956 年 10 月 16 日。
- [19]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349 页。
- [20] 支克坚:《关于阿 Q 的“革命”问题》,《文学评论丛刊》1979 年第四辑。
- [21] 陈涌的话是 1982 年 8 月在烟台举办的全国鲁迅研究讲习班上,我作为主持人亲耳所闻。
- [22] 鲁迅:《340602 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 13 卷,第 135 页。
- [23] 转引自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第 182 页,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 [24] 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辛未艾译,《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 2 卷,第 361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
- [25] 转引自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李春林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26] 鲁迅:《301013 致王乔南》,《鲁迅全集》第 12 卷,第 247 页。
- [27] 尔辑:《〈王先生的秘密〉和阿 Q 精神》,《汇编》第 1 卷,第 1142 页。
- [28] 王冶秋:《〈阿 Q 正传〉读书随笔》,《汇编》第 3 卷,第 345 页。
- [29] 《林希谈枕边书》,《中华读书报》2020 年 7 月 1 日。
- [30] 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250 页。
- [31] 来自唐弢先生与我和文学研究所一些年轻同事的谈话。
- [32] 毕飞宇:《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读〈阿 Q 正传〉》,《文学评论》2017 年第 4 期。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
责任编辑:高华鑫